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观潮

从挖掉“两座大山”到推翻“三座大山”

——官僚资本主义为何被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之一

■郝铁川

解放战争时期，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维护者和欺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要被人革命、历史唾弃。

众所周知,1922年党的二大正式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对象。所以,直到1945年春天召开的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还借寓言故事《愚公移山》,形象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挖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毛泽东说,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

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但三年之后的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把原来挖掉两座大山,改成了我们后来习惯所称的推翻“三座大山”。他说:“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3,1316—1317页)

为什么这时要把官僚资本主义增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呢?其实,毛泽东此前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就已

经给了答案。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抗战时期的抗战派,堕落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充当美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同志指出,蒋介石所发动的内战,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在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因此,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第二,蒋、宋、孔、陈大家族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堕落为全国最大的垄断资本家集团。毛泽东同志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

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

以上两点是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所作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即:蒋介石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迅速贪污腐败,当时被称之为“五子登科”,即房子、条子(指金条)、票子、车子、婊子。据当时参加湘鄂赣区接收清查团的监察委员何文总结,接收中的贪赃枉法可分四种情况。其一是抢,即接收之初公开抢占敌伪房产和金银珠宝等财产,仅上海一地的8500多幢敌伪房产中,被抢占的就达5000多幢;其二是占,即以单位名义占有,再化公为私(如南京2000多幢敌伪房屋,几乎全由各单位以各种名义占据),其后发展为只要是敌伪财产,贴上封条就可据为己有;其三是偷,或是监守自盗(如汉口宝安大楼原存有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最后查封时已所余无几),或是通过外人直接盗窃,不仅窃走了物资,还对财产本身造成了极大破坏(如上海流氓李兴等盗

窃团伙);其四是漏,即日本人为了讨接收人员欢心,故意在移交清册中漏列若干财产,使之不经任何手续即落入接收人员私囊(如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在移交时留下了百亿元无清册物资),而移交物资层层转手,加造清册,又有不少被截留。在这个过程中,接收官员以敌产名义强占民产,或在收受贿赂之后,将敌主发还者,均所在多有。国民党接收过程中最为恶劣、最引起收复区百姓不满与反感的政策,是法币与伪币兑换率的规定。根据9月27日其财政部公布的法币与汪伪中储券的兑换办法,两者比例为1比200,这对收复区人民无异一场灾难,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对于接收中的混乱不堪、贪赃枉法,当时舆论多有报道和批评。《时事新报》在社评中问道:“政府究竟替老百姓做了些什么?”中国民间舆论的喉舌《大公报》在短短半个月中两次发表社评:《收复失土不要失去人心》《莫失尽人心》,痛斥当局“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因此,在抗战结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我们党之所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个革命对象之后,又把官僚资本主义增列为革命对象,是因为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完全成为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维护者和欺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道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当然要被人民革命、历史唾弃。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讲好党史

■沈斐

在当前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中,如何把握“史料”与“党性”、“史料”与“理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好党史学习教育与原有红色现场教学的关系,是党史宣讲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党史课不是一般的“历史课”。习近平总书记提倡的党史学习,归根结底是教育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让全党明白,中国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出发、到哪里去、奋斗目标是什么?决定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探索;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怎样展现新气象、体现新作为?这样的“历史课”必然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鲜明的党性原则,即阶级性、人民性、先进性、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等内在规定,以及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政治立场。

党史宣讲要坚持正确的党史观。要善于甄别伪史野史,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史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面对一些错综复杂的史料,要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分析。党的历史归根到底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评价,必须以维护绝大

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来作为评价标准。

党史宣讲要以人民的立场面向大众。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告诉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动方式传播党史知识,用大众话语讲好党史事件和党史人物。党史宣讲要走出家牙塔,深深植根人民、服务群众、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引导党员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党史宣讲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在讲述党史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正反两方面的案例,阐明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要善于理论辨析,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驳各种唯心主义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史宣讲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其中。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讲好党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堂优秀的党性课和理论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树立大历史观。什么是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不是单指过去的事件,不是过去史料的简单堆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不仅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我们回顾过去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的未来。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帮助广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重温并坚定中国共产党

人“三为三谋”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大历史观。

立足大历史观,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梳理史料、分析史料;要善于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理解和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要善于从史料中提炼经验教训和启示,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风险挑战提出因应之策。

立足大历史观,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历史证明,28个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教条主义贻误中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中国革命,还是在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都在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讲好百年奋斗

史,就是要讲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增进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不能用红色场馆参观、红色旅游体验代替党史学习教育,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并不意味不能进一步把红色场馆打造成党史学习教育的特色课堂。

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知识世界、情感世界、意志世界的三者统一。党史学习教育应当善于利用红色现场教学所特有的情感教育、意志教育功能,在参观讲解的基础上再加上专家理论提升。通过历史事件和史人物讲清楚党的创新理论,通过回望过往的奋斗路讲清楚前方的奋进路,让党史学习教育立体丰满、有血有肉。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

从哲学维度深入解读脱贫攻坚精神

■夏明月 杨璧源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括,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从哲学维度解读脱贫攻坚精神,其自身的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内在逻辑自成一体。“上下同心”的整体性理念体现了脱贫攻坚的本体论意蕴,回答了脱贫理念的本体内核;“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是脱贫攻坚方法论层面的表达,是对如何实现脱贫的回应;“不负人民”则是脱贫攻坚的价值论体现,是“为谁脱贫”问题的回答。

本体论意蕴

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活动需要依靠类共同体实现。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诠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汇集成一个合理有序的整体,形成了单个部分所不能达到的功能,共同向贫

困宣战,举国同心,合力攻坚,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各个部分在整体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得整体功能得到了最大发挥。党组织各级力量构建起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了全社会扶贫强大合力。千千万万的扶贫善举彰显了社会大爱,传承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这种“上下同心”的整体性思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一切前进中艰难险阻的精神武器,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战胜贫困、创造世界奇迹的精神武器。

方法论意蕴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干,一任接着一任的坚守,尽锐出战的奉献,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断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他们在扶贫攻坚的过程中,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用自己的辛苦换来贫困群众的幸福,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了社会价值;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行动践诺言,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呕心沥血、建功立业,实现了自我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 and 创新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从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理,尊重客观规律,紧紧抓住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将发挥主观能动性 with 客观规律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扎根基层,精准落实,“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精准扶贫”的独特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政策体系、工作体

系、制度体系,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风貌。这种敢闯敢试、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彰显非同寻常的胸怀与格局。

对于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基础条件薄弱、致贫原因复杂的“贫中之贫、艰中之艰”地区,中国共产党迎难而上,凭借攻坚克难的顽强精神,逐个攻克难关,通过量的不断累积,最终实现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的质的飞跃。在扶贫攻坚的战役中,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从量变积累质变,最终取得了脱贫攻坚胜利的重大历史性成就。

价值论意蕴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和人民选择了党,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要为人民。“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摆脱贫困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梦想,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负人民期待,集中力量解决人民贫困问题。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坚定地走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获得了广大的人民支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脱贫攻坚精神筑起一座新的精神丰碑,必将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动力。

(作者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助理研究员)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迈好开局的第一步,殊为关键。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深刻把握世界正从互联网向物联网转变的发展潮流,积极拥抱波澜壮阔的数字时代。

对于上海来说,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扎实基础:上海已经基本建成了四个中心,已经形成有影响力的世界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一网通办”被列入联合国数字经济十大案例之一,世界智慧城市大奖2020年被上海摘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全方位、立体式的,涉及数字经济、数字产业、数字社会、数字科技、数字治理、数字安全、数字规则等多个领域,诸多概念和理论尚不成熟,需要不断努力,深耕细作,才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数字化转型与新发展理念十分契合。就创新而言,数字经济唯创新是举;就协调而言,数字时代要协调各方,例如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交织的时代,要使所有人都能努力跨越数字鸿沟;就绿色而言,要结合我国所承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始终坚持数字经济要以绿色为本、节能降耗为要;就开放而言,要以更大的开放倒逼更深入的改革,数字化转型既要自食其力,又要强调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就共享而言,要在人民不断共享数字经济成果的环境中发展数字经济。因而,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始终,将数字化创新能力培育成为核心竞争力,围绕治理数字化、生活数字化、经济数字化等,做到规划在前、规则在后、落地扎实、推动有效。

数字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形态,要用好方法论,谋定而后动。博学之,这是前提,要为上海数字化转型把脉问诊,博采众长、学而习之;审问之,不断自我发问,究竟如何破解数字化转型这一题目;慎思之,要沉下心来认真思考、不断打磨,最终形成思想的火花和结晶;明辨之,上海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龙头,是中国最倚重和世界最瞩目的城市之一,进一步转型升级离不开系统研究和可操作性思路;笃行之,数字化转型要做到政策有延续性,符合社会以及民众所期望的稳定性,也就是可预期;通过“比”来找差距、通过“学”来找方法、通过“赶”来增动力、通过“超”来定目标。

数字化大潮浩荡荡荡,必须把握重点,坚持“三个导向”。一是坚持市场导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是坚持创新导向,解决“卡脖子”问题,掌握更多自主核心技术;三是坚持安全导向,要强调安全可靠。

例如,在发挥市场机制方面,要瞄准上海在“两业融合”和“两化融合”上存在的问题,促进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信息的整合共享、区域的协同联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是必然趋势。因而,要把促进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作为推动产业链水平的突破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主导。

又如自主创新,以上海“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为代表的数字治理体系目前还在探索中,其对传统的管理思维和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倒逼包括场景再造、业务再造、管理再造、服务再造在内的整体性转变。要以数字全面赋能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为目标,充分利用和发挥“两张网”平台聚集的设备、技术、信息以及数据所蕴含的可以促进城市治理及发展的丰富资源,努力形成数字治理的上海标准和上海方案。同时,在“两张网”建设和迭代的过程中,还可发挥其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策源和高端产业引领的新引擎作用,催生出一批新技术,形成一批新成果。

再如安全问题,数字化背景下的安全问题影响范围将更加广泛,除了信息问题、权属问题、使用问题、监管问题之外,还有信息数据跨境、调取和使用的问题。因而,一方面,要畅通数据使用、共享的渠道,使数据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促进创新创业;另一方面,要规范数据安全 and 交易制度,提升安全保护措施,加强民众自身的保护意识,构筑起数字经济防线。

城市数字化转型是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战略。全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上海在数字化的新跑道上奋勇前行!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数字化转型开启发展新赛道

周汉民